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二一期 ——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12a)

【亡灵祭坛】	石榴花落——妈妈孙历生之死	于小红
【史海钩沉】	我对原北京女三中文革情况的补充	陈寿仁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十六)	孙怒涛
【往事非烟】	不可遗忘的历史——《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序	钱理群
【抗拒遗忘】	韶华如水忆逝年 ——《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跋	奚学瑶·张 从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亡灵祭坛】

石榴花落——妈妈孙历生之死

• 于小红 •

(编者按：本文摘自于小红“白花丁香树”一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 妈妈偷偷回家

妈妈在女三中从1966年开始就挨斗，沙坪校长死时她已失去自由，每次放出来回家取东西，她就会匆匆来看姥姥和我们一眼。

这一次她偷偷回来看我们，也在姥姥梳妆台上放了钱。(离婚后，妈妈每月从微薄工资中拿出十五块钱放在姥姥梳妆台上)。

妈妈通常只穿白衬衫，没有斑斑点点的衬衫，所以我们一下子就知道了妈妈受折磨了。

她身上总是看到大块的瘀青，我们看了心疼，她就会轻描淡写的说是血管脆弱，比别人更容易青紫，反而挨打比较少，别的老师挨的打比她严重的多。

当姥姥问起那些人怎么打人，妈妈就把孩子们支开，不让听。

◇ 来了小板车

1966年8月某天下午，戴着红袖章的大妈们来了，她们推着小板车，在胡同里挨家挨户发面粉，指派接待串联的学生人数（例如每家十人）。她们用秤杆，按学生人数派发给多少斤两的白面粉，告知要给红卫兵做饭吃。

人生一切都是不可预料的命运，街坊大妈派发面粉的时候，正巧大姨家的女儿从沈阳来了。

表姐她比我大一岁，穿着军装、军帽、袖章、胸章、扎着皮带。看着同龄人走南闯北，人家正牌老子英雄的红卫兵，威风凛凛、大有作为的样子，令人羡慕。表姐拉了我问“怎么不当红卫兵？”我弱弱地答“妈妈”，她迟疑了一下子（明白妈妈是右派）就不再说话了。

我们拿了三个盆子接了面粉。看到表姐风尘仆仆的样子，姥姥本想留她在家吃饭，没想到她一转身就没了踪影。姥姥说“表姐没能在家吃饭，我们蒸一次包子给别的串联孩子们吃吧，他们太苦了。光是白菜没油不行，去买些肥肉吧。”胡同口的肉店五点关门，我先去买了一块肉，然后把面揉了隔夜发了。

（日后感想：如果表姐没在那关键时刻出现，我们就不会蒸菜肉包子。如果她留下来，第二天，正牌红卫兵或许可以阻挡乡下杂牌军，姥姥或许不会被打得那么惨。）

◇ 菜肉包子惹麻烦

第二天一早，我帮姥姥和小姨剁了一大盆白菜拌了一些肉进去，蒸了一百多个菜肉包子。中午开饭了，包子一抢而光。

听说有包子吃，更多红卫兵从别人家跑过来。因为我们包了包子，别人家吃的是馒头咸菜，吃了包子的佳木斯六中红卫兵就认定我们是地主、资本家。吃完包子后，他们开始到处搜，最后翻出一张房契，他们说这是“变天账”。

这帮学生没穿军装，算不上正牌老子英雄的红卫兵，也没有铜扣皮带好抽人，于是拆了板子打人，跑到附近邻居拿了三四把铁锹、拔了玉米秆，有人开始挖地，有人把玉米秆折半、抓着头尾成双棒抽人（不知他们乡下孩子是否如此对待牲畜），姥姥的薄衫被打成一条条挂在背上。

姥爷当时已经在工业学院被审查，家里只有姥姥、小姨、我们三个孩子、还有小姨刚刚生下十天的小表妹。姥姥被剪了阴阳头，烈日下跪在地上被板子打、被玉米秆抽。比我大九岁的小姨生完孩子才十天，她也被他们拉出来在烈日下罚跪，婴儿在南房里哭啼没人管。

看热闹的人说我妈妈是右派，就在附近的女三中，结果一群人跑到女三中把妈妈押来。据妹妹小康所述，妈妈一进来就自己跪到姥姥身边，看着他们自动“坦白罪行”，他们下手就减轻了。

我们被命令罚站，家里一切被打碎之后，他们挑破了房子的顶棚，挖开房子里的方砖，掘

地三尺。坑挖得三四尺深，小蓓吓得紧紧攥着我的手，以为要被活埋。姥姥在我和小康身上藏了钱。自从姥爷被抓走，姥姥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教给我和小康怎么自己想办法生存，万一发生了什么，别丢了小蓓。那救命钱是绑在我们身上的，我当时真怕他们搜身，一直在想如果钱搜出来怎么逃，我想我们一定会没命。

◇ 第一次做饭

从早上打到晚上，红卫兵们累了，撤走了，妈妈也被拉走了，姥姥被打得后背血肉模糊。我和小康搬来床板，放在坑上，让姥姥趴着。中午包子被抢光了，我们一家从早上就没吃、没喝、没上厕所。姥姥呻吟着，叫我找水给她。红卫兵们喝完水，把暖瓶玻璃杯也都丢到坑里砸了。我只找到一只搪瓷碗里有点喝剩的水，喂姥姥喝了。姥姥挣扎着叫我给全家做饭吃。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做饭。我和小康找来一个蜂窝煤炉，火点不着。撕破的书，打烂的家具比比皆是。我们花了好长时间用书和家具点起了一堆火。幸运的是在一个罐子里找到了一点米，南房后院夹道棚子里，姥姥有一坛刚刚腌的鸡蛋没被发现，我们煮了粥和鸡蛋。

那天晚上，姥姥趴在坑上的板子上，我们睡在屋檐下的廊子上。

姥姥卧床不起了。从那天起，我成了整个家庭的顶梁柱，每天往返于牛棚之间传递着亲人们的消息：姥爷、爸爸、妈妈；去姥爷单位领生活费，煮粥、做饭。小姨父是现行反革命，不能回家。小表妹没人带，我也得帮忙。带着小康推着竹子小童车，变卖了家里打烂的东西来贴补家用，把土填回红卫兵在房子里挖的深坑。

爸爸能给姥姥的钱也只有几十块了，幸亏姥姥藏了一些钱，藏在我们这些女孩身上的救命钱。

◇ 第一次缝衣

爸爸家的小妹妹小庆这时候快出世了，姥姥让我找出抄家没被拿走得一块花布说“那个孩子不管怎么说，也是你们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们现在也遭难了，你帮着我，咱们缝个小被子，小棉袄吧。”姥姥趴着，缝不了，我的针线活就是这么一针一线开始学的。

爸爸的稿费大多用于买书，他当时有几万册藏书，我们也要帮继母把书籍当废纸卖。他们必须搬家，书只能这么处理。精装书是不值钱的，要把书皮扯掉才能卖。小康跟着我卖书，我们每天得去卖至少两小车书。只要没看见，小康就躲起来，在那些书消失之前多看几个字。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度过了1966年。爸爸似乎是选择性记忆，多少年后他写《文革中的我》，只写了他可以“阿Q”一下、感觉自我胜利的内容。我希望我的事实陈述可以作为他那本书的补充。

◇ 遭殃的胡同

我从早到晚忙，没有告诉姥姥我看到了些什么，也没有去关心自己家以外的事。直到有一天，姥姥让我放下手里的活，和我说起其他人。

姥姥家住老门牌26号，25号住着小梅一家。小梅爱跳舞，会用脚尖走路，是我胡同里的小朋友。姥姥一说，我想起很久没有看到过她了。姥姥让我去找老保姆打听，她的父母被打死了，她不知被谁领走了。姥爷的弟弟和弟妹住在28号，他们被赶回了沧州老家，说是地主，老家的人说他们饿死了（没有给他们分粮）。二姥姥很胖，死的时候皮包骨。27号一墙之隔住

着王蒙、王澈一家。他们家的小孩以前和我一起玩，如今谁也不会来往了。

◇ 老云南白药

妈妈又一次被放出来回家，应该是拿换洗衣服的，被允许的时间有限。

看到她的白衬衫又斑斑点点了，姥姥就让我找出换洗的衣服给她。

妈妈僵硬地慢慢地把衣服脱下来，趴在板子上的姥姥指挥着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不知存了多久的云南白药，姥姥爬不起来，也挣扎着给妈妈清理伤口、涂药。她们叫我去洗衣服，把我支开好说悄悄话。

我洗了很久，衣服上的血迹怎么也洗不掉。

因为妈妈停留的时间长了些，她没能回到自己家里看小同妹妹就直接回学校了，姥姥叫我们到她家探视，因为她家大人只剩聂老夫人了。

“不管别人说什么，你们的妈妈是最好的人，你们长大必须帮助她”。姥姥经常告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千万不能学妈妈，她太容易被害了”。

◇ 粮票的牵挂

妈妈每个月都会回家拿粮票，如果过了一段时间没取，姥姥会很担心，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妈妈学校里的信息。

我们常用的白塔寺公车站就在女三中附近，我们想进去探探消息，可是门口挂着“女三中革命委员会”的大红字牌，还有红卫兵出没，徘徊了几次也不敢进去。

◇ 石榴花落

牛棚中历尽折磨的妈妈走了（7 / 1 2 / 1 9 6 8）。她怎么死的我们不知道，只知道整她最厉害的是董光苔，烈士子女（其父亲董振堂）。在我爸爸妈妈结婚时，董是妈妈女三中同事，曾是妈妈的好友，当时董得病，因为她母亲不是法定妻子，很长时间没能定为烈属，家里拮据。我爸爸当时稿费多，相对丰裕，姥姥说大概有一年多妈妈拿到工资，看也不看就全都给了董，但是这样做也就被嫉妒怀恨了。

文革一开始，董光苔也在牛棚，她母亲向毛主席求救，据说毛亲笔批示“此人无大过仍可用”，凭着毛的纸条出了牛棚，当上了革委会主任后拼命整人。

妈妈死前告诉姥姥，如果她没了，就是死在董光苔的手里了。

妈妈死的前一晚，小蓓跟着姥姥睡，偷听了妈妈和姥姥的谈话，提到了那棵石榴树。（“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儿安危”）

女三中革委会来人时，小蓓一个人拿小铲子正在院子里挖土，我和小康不在家。小蓓说，那一天她一直在院子里蹲在地上挖土。来人还没说话，她已经知道妈妈没了。骨灰不让留，聂叔叔偷偷抓了一把带回家。去年我们安放妈妈骨灰时，吃惊地发现聂叔叔冒险留下的竟然是那

么少，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

不出一个月，八月某一天，在七机部工作的年仅29岁的小姨父也死了。小姨没能见上丈夫最后一面，连骨灰都没见到，那天小姨家的小表妹刚满两岁，她还没来得及叫爸爸。那时聂叔叔也被整，聂老先生文革前已经去世，由聂老夫人带着小同妹妹，姥姥经常派我们去打听。

她关心所有的后辈，姥姥就像老母鸡一样，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被她呵护着，在她的臂膀下学会做人。

冬天早上，姥姥蹲在地上用一双铁筷子从炉渣中挑出没有烧干净的煤核。把我们的衣服穿在烟囱上弄暖和了再叫我们起床。她非常节俭，但是从来不让我们缺少任何学习用品。

姥姥收留的智障女孩，她也教会识字，再帮着找工作和对象生下孩子。

姥姥爱我们，她关心身边所有的人，自己却从来一无所求。至于那棵石榴树，姥姥说看到了几次白影子，她女儿（我妈妈）的影子。一个动荡时代的影子，石榴花落，来年开否？

◇ 宁夏与陕北

后来我去陕北安塞插队（1969），爸爸蹲五七干校，我去宁夏看他，帮他养猪、种旱稻。看到他养的猪又肥又大，我跟他讲陕北的土猪长不大养不肥，要是能改良就好了。

爸爸送我他“四清”穿过的大棉袄和一些植物种子，这些东西后来发挥了作用。植物种子种出了大冬瓜，附近农民都来看“科学种田”。当时爸爸的生活费每月只有20元，不知他如何省吃俭用才攒了30元买了两头小白种猪，带小猪到陕北的过程十分艰难，遇到大雪封山等困难，路上走了十天。后来，方圆几十里就有小猪后代。

妈妈的经历无疑地影响了我，姥姥的告诫“防人之心不可无”，诚然不错。但是，防范别人费心机，我们不如珍惜周遭善良的人，例如妈妈一生没有害过人，至少到死也没有害人的机会和念头。动荡期间，有些被害者本身也是加害者，但是妈妈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受害者。

◇ 合影缺一人

爸爸晚年告诉我妈妈死前几个星期，他们见过面，他知道清理阶级队伍，妈妈会再次遇到风险，但他没想到是诀别。爸爸有机会回家一次，结果他去了白塔寺。我无论如何想不出来他和妈妈是怎样取得联系的。爸爸说买了几个包子，在学校旁边名叫罗圈胡同的隐蔽胡同里和妈妈见了面。妈妈买了两根冰棍，他们钻进小胡同转了半个多小时。他说的时候哭了。

我有时觉得爸爸对不起妈妈，但又常常觉得他实际很可怜，被迫和自己心爱的人分了手，自己的女儿不能公开承认，我心里埋怨他懦弱。爸爸看上去是一个极为乐观的人，一个停不住的大忙人，其实他心里埋藏了别人无法想象的苦痛。他不能停，只有工作才能让他忘却，他心里某一处伤痛是不能触碰的，他尽一切可能封存。

爸爸八十多岁第一次脑血栓之后，悄悄问过我几次妈妈的生日，他说他想不起来了。怕我误解，为了说明这是生病造成的，他专门去问住院在他隔壁的曹禹。”你太太生日是什么时候？“曹禹回答不出，过了两天才想起来。曹禹的糊涂他和我说了多遍。

这几天清理老照片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我们姊妹三人和爸爸的一张合影，这是一张在西四北大街照相馆拍的照片，拍照的时间是1968年九月，妈妈死后不久。我们怎么也想不起来爸爸怎么来的，我们怎么去的照相馆，他和姥姥当时说了什么。这一次他没有顾忌什么，他跟亡故前妻的女儿们照了相。

◇ 结语

作为于光远五个女儿中最年长的一个，我讲了我们家的故事。

每个人知道的只是极小的历史片断和表面看去不好解释的现象，我们身处的不同的地位和年龄，同样的事件在我们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同的痕迹。大家一起讲述我们父母那代的事情，我讲出来，您也讲出来，大家一起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

□ 读者投稿

~~~~~

#### 【史海钩沉】

#### 我对原北京女三中文革情况的补充

• 陈寿仁 •

2007年4月

尊敬的王友琴教授：

我叫陈寿仁，是原北京女三中（文革后改为159中）的历史老师（已于1988年退休）。我是当年女三中“文革”的目睹者与亲身经历者。几年前，我在美国上网时偶然点击，看到您在网上写的关于文革的文章。我非常钦佩和感谢您的胆识——敢于触动那些被认为敏感的内容。我很早就想给您写信。但又由于年老（我已80多岁）体弱，更想事情已经过去40年了，何必再多事！就迟迟没有动笔。但是不久前与几位老朋友谈及此事，最近又见到《燕大校友通讯》上刊载的有关回忆卞仲耘校长的文章，朋友们都希望我也写写当年的情况，我自己也想是有必要留下一些史料。把一些真实的场景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所以我决定给您写信。

为了如实地反映当年的真实情况，我向原来老女三中，目前健在的老师进行调查核实，而且将初稿送给苏令娴和段然登等老师补充修正。从而写成《我对北京原女三中文革情况的补充》一文，附后，请收阅。

#### 一、关于沙坪校长被打死

沙坪校长在1966年8月20日被打死。

1966年8月19日（那是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小将，改师大女附中宋彬彬为宋要武的第二天）晚上，在学校西小院的小房子里，红卫兵声称为了第二天的斗争会，要把沙坪“杀一杀威风”，或许也是想表示女三中红卫兵的霸气，她们用老虎凳、皮鞭、冷水和捆着带钉子鞋底の木棍等，一直拷打沙坪到深夜。

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原女三中的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批斗会上，当众被殴打至死。斗争会上，红卫兵揪住沙坪的头发，不断令她抬起头来，致使头发被薅下来，散落一地。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旁边一滩血迹，是副校长熊易华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砖头落下时，把熊的额头打破，血滴在地面上形成的。

沙坪倒下之后，为了验证她是否“装死”，有一个红卫兵不知从哪里拿来一只刺猬咬沙坪的喉头，证明确已死亡，便送去人民医院进行解剖。事后她们对“劳改队”成员吼道：“大鲨鱼（他们对沙坪的称呼）肚里没有一粒粮食，全是黄油。你们若不老实，大鲨鱼就是你们的榜样！”

时至今日，我仍不理解，在所谓“执行了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了小绵羊式的修正主义苗苗”之后，怎么会在一夜之间，这些温柔的“小绵羊”竟然变成毫无人性，如此残暴凶狠的狼。

## 二、关于“劳改队”

文革中女三中“劳改队”有前期与后期之别。

前期“劳改队”成立于“文革”初期，时间大约是在1966年初工作组撤离后，当时学校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文化革命委员”（据说我校是西城区唯一一个没有老师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八个学生组成（赵卫平、谢南萍、周稚英、王彬彬、桑慧敏、刘南南、张兰兰和南新志）。并由高一四班的学生王新平担任“劳改队”的大队长，负责看管被关押的“劳改队”。并由王新平亲自率领数十名以初中同学为主的红卫兵看守。她们除拳打脚踢，木枪打，皮鞭抽，罚下跪，大弯腰，让乘“喷气式飞机”，干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外，还有一种难熬的刑罚——不让睡觉，让这些“劳改队员”跪在西小院的职工小食堂里，抬头看天花板，不许眨眼，谁眨就把清凉油抹进谁的眼里。

前期劳改队又分为“劳改一队”和“劳改二队”。一队的专政对象被认为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学校领导层成员（沙坪、熊易华、路维敏和董光苔等）和“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反革命分子”（房凤敏）。二队则被认为是“严重问题”的人（能回忆起来的有教员张希颜、王邦国、方婷芝、苏令娴、周南、陈寿仁；职员王秉纯、盛荃生和孙历生等）。

后期劳改队成立于“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是由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的，被纳入劳改队的确切人数不详，但其中大多数为1957年划的“右派分子”和“有历史问题”的人。

前、后期两次组成的“劳改队”，其性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都是把部分教职工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既残酷折磨他们的肉体，又要无情摧残他们的灵魂。前期尤甚，在虐待、残害、折磨的方式与手段上，已达到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疯狂的、登峰造极、超法西斯的恐怖程度。

## 三、董光苔不是“文革”的受害者

董光苔是《毛泽东选集》中所提到“宁都起义”董振堂的侄女。在董振堂牺牲后，被过继到董振堂夫人名下，成为烈士子女。文革初期，她因在女三中担任党支部副书记，也曾进入过前期的“劳改队”，受到过一些冲击和迫害，但时间不长。传言董振堂的夫人在董光苔进入“劳改队”后，曾写信给党中央要求解放她，不久即获得林彪副统帅的“如无大过，保其过关”的

批示（此批示有人亲眼看见过）。在一次组织全体教职工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活动中，她为烈士扫墓哭灵，从此她被解放并成为“革命干部”，也是后期“三结合”的主要领导。自“解放军支左部队”进校开始，她一直担任革委会主任工作，忠实执行文革中官方的各项整人指示，也是文革中女三中各项整人措施的倡导者和的执行者。许多女三中的同仁在文革中被逼疯、被迫害至死，和董光苔贯彻执行极左路线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她不能说是文革的受害者。

#### 四、文革中在原女三中被迫害致死的人名录：

##### （一）死于“文革”早期：

沙坪，原女三中校长、党支部书记。1966年8月20日全校斗争大会上，死于红卫兵的木枪和皮鞭之下。

张梅岩，原女三中数学教师（女）。张老师一向循规蹈矩、谨小慎微、教学成绩优秀。在红卫兵“破四旧”时，由学校的体育老师李xx带领红卫兵去抄家，张遭到威胁和迫害，在家中服“敌敌畏”自尽。

何世瑾，原女三中体育老师（女），在“文革”初期，死于家中，由于她的家和学校距离较远，情况不明。

死于女三中校内但不是女三中成员的两人。

马宝山的妻子，住在女三中马路对面，是由女三中的红卫兵向居委会了解情况，由居委会提供为“破鞋”而被抓来我校的。她是普通老百姓，是七个孩子的母亲，红卫兵把她关在西小院，令其交代问题，在受尽辱骂和毒打折磨之后，她已无法忍耐时说“还不如让我死了好”。打手们狞笑地说：“那你就上吊吧！”于是扔给她一根绳。她自己悬于西小院的树上，在女红卫兵的哈哈大笑中自尽而死。她死后尸体放在一间小破屋里，红卫兵强迫“劳改队”中的老师去摸死尸。

“老地主”，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男），至今详情不明。当时是由红卫兵从社会上抓来，以“老地主”身份遭毒打折磨一夜致死。第二天清晨，红卫兵从“第二劳改队”中叫王秉纯、王邦国等四个男队员到学校厨房后院，将此人抬出学校西门外，抛尸街头。

##### （二）死于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1968—69）时期

方婷芝，女，女三中化学老师，文革初期有人写大字报诬陷她是从“歌乐山”（小说《红岩》中写的“中美合作所”所在地）来的，意思是她是特务（实际上她是从四川洛山师范学院来北京的）。她因此而被打入“第二劳改队”。“清队”时她成为被整的重点人物。一天晚上，董光苔找方婷芝谈话，内容不详，外人只知道第二天下午要开方的批斗会。第二天中午，方在被迫害的情况下，神思恍惚，拿着水杯走出校门，过马路时被13路公共汽车撞死，而董光苔却向群众宣布“方婷芝畏罪自杀”，致使其爱人高诒善（北京钢铁学院金相系主任）在方婷芝车祸后数日，自杀身亡。

孙历生，女，女三中职员，孙是女三中1952年毕业留校的政治老师，后来是党支部副书记，1957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被划为“右派分子”，回到女三中后做职员工作，一直处于被专政的地位。文革初期打入“劳改队”，受尽折磨。“清队”时，董光苔说她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一天晚上，在开完孙历生的批判会时，扬言要重新给她戴上右派帽子。第二天，



人们发现孙历生在操场后面的厕所里上吊自杀。那一天是1968年7月12日。

## 五、“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女三中抓出的“反革命分子”

“历史反革命”有蔡世芳（化学老师）、王秉纯（教导处职员）、傅德文（厨师）、陈全珍（语文教师、女）。陈全珍是开全校大会当场揪出的“深藏在学校的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分子”，后经查明陈全珍根本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所有材料都是不实之词。

还有孙瑞英（体育老师、女）。孙瑞英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是她用针扎毛主席像。事实上是她在做完针线活后，顺手将缝衣针别在墙上的毛主席像边的白纸上。

## 六、“文革”中被迫害致疯的盛荃生

盛荃生，男，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还是名教授黄药眠的研究生。1953年被分配至女三中担任语文教师，教学成绩优秀，深得学生爱戴。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摘了帽子”，但一直被校领导视为“另类”，处于受歧视和不被重用的地位。文革中被打入劳改队，受尽折磨。“清队”时，董光苔也说他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他和孙历生一样变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

在批斗中，盛荃生开始神经错乱。当教务处王燕红向党组织反映盛的行为反常、独自用笔不断在纸上画道道、所答非所问时，董光苔说：“盛荃生是装疯”，并先后组织了大小三十余次批判斗争会，最后，盛荃生终于疯了。从此成了废人，时时发病住进精神病医院。2005年含恨而死。

## 七、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职工家属

于晓岩的爱人齐XX，四十一中校长  
孙静的爱人何XX，外国语学院老师  
邵贞悌的爱人，人民银行干部  
张翰的爱人马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方婷芝的爱人高诒善，北京钢铁学院教授  
何世瑾的爱人，北京安定医院医师  
王秉纯的爱人，某小学老师

以上只是我回忆到，并和其他同事核对过的名录。可能不止这些。家属们分别隶属于不同单位，自杀的原因也各有不同，罗列出来，只不过是说明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对我校（原女三中）教职员工的摧残（全校约120名教职员工中90%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还杀害了他们的家属，致使许多家庭支离破碎，甚至家破人亡。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十六）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3 1 0 a，第七章 4 1 4 的外战和内斗（1 9 6 7. 6—1 9 6 8. 9）〕

4、沈如槐与“东方红战团”对《必胜》的态度

周泉纁用“东方红战团”核心组名义发表的“《必胜》是完全正确的”声明，从本质上说也是实情，并非谎话。《必胜》所表达的观点，确实是“东方红战团”核心层的观点。沈如槐仅仅对派别的规律性和把四一四思潮与“河造总”联系在一起，有不同意见，有些不满。沈如槐坦承，《必胜》中“所谓比较尖端的观点，周泉纁或在“东方红战团”或在私下都阐述过，我们都不陌生，并且都很赞同。”沈如槐甚至对《必胜》提高到这样绝对的程度：“批判《必胜》就是批判 4 1 4，否定《必胜》就是否定 4 1 4。”这与我认为是的《必胜》里面的正确观点也仅仅是四一四思潮的一部分，更何况还有错误的、不属于四一四思潮范畴的那些内容的认识是有很大差距的。

团派批了一阵《必胜》，热情慢慢消退。周泉纁不甘心《必胜》就此淡出人们的视线。他开始用炮打陈伯达吸引大家的眼球，再次把焦点集中到他身上。

沈如槐支持《必胜》，但是不赞成周泉纁《炮打》。沈如槐说：我“劝他千万不要贴这样的大字报。……你是 4 1 4 总部委员，炮打陈伯达会给 4 1 4 带来极大的被动，搞不好会让整个 4 1 4 背上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4 1 4 刚刚经历了一次冲击，一次洗礼，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经不起再三折腾，你把 4 1 4 的队伍搞乱了，我们还怎么去和蒯大富斗？”周泉纁不听，他就是耍一意孤行，再一次的折腾 4 1 4。当时“三七战团”的人就议论：别人看到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避之唯恐不及，周泉纁是抢着要去戴这顶帽子，硬闯着非得进监牢的门不可！

如果说，《必胜》引发了 4 1 4 的内部矛盾，使得“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的分歧公开化的话，那么《炮打》引爆了 4 1 4 内部最严重的一场内讧。

尽管外界的压力是如此的巨大，沈如槐仍然以“一批二保”的对策死保周泉纁。其实，“一批”是为了应付中央的批评、应付团派的进攻、应付 4 1 4 内部的不满情绪不得已而为之。他既不认为周泉纁的观点有错，更认为他在反对老蒯拉 4 1 4 独立上是有功之臣。所以“一批”只是幌子。至于“二保”是实实在在的一味死保。他借口江青只说了周泉纁是“小丑”，没说他是“反革命小丑”，所以不能当做反革命分子抓起来。为了防止团派把周泉纁扭送到公安局，“东方红战团”的头头千方百计地为周泉纁找了一个秘密去处藏匿起来。他们对周泉纁的支持已经达到纵容的程度，对他的保护已经达到包庇的程度。

“三七战团”批《必胜》，批周泉纁，自不待说了，火气更大，火力更猛。4 1 4 的战斗组几乎一边倒地周对周泉纁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同时也严厉指责沈如槐。有一些战斗组“坚决要求改组 4 1 4 总部，把总部中的‘周泉纁分子’拉下马。”那段时间，直接找我的教师、总部委员很多，态度可以用“怒不可遏”来形容。有位教师气愤到极点，对我说：总部一定要明确表态，一定要采取果断措施，绝不能因为周泉纁一个人葬送了 4 1 4 的前途，让一粒屎坏了一锅汤！

即使在“东方红战团”的核心中，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如在 4 1 4 中有极高威望的宿长忠就是赞同批《必胜》，对周泉纁炮打的做法深为反感的。

我对沈如槐坚韧不拔的品质是很欣赏的。我自知我在坚韧性上比他差得很远。他在解放干部的问题上，敢于顶着压力不断冲击，事实证明他做得对，坚持得好。但是在周泉纁问题上，他的“坚韧不拔”已经变成了固执己见。为了保他的爱将，作为 4 1 4 这一群体的一把手，沈

如槐宁愿置414绝大多数群众的坚决反对而不顾，置414面临被分裂、解体、压垮的严重危机而不顾。从“东方红战团”的小团体或他与周泉纓的个人情谊而言，我无话可说，但是作为414这个有着七千人的群众组织的首脑，我认为这是极不应该的。对此，我大为不满。

正如“智擒王光美”事件让我开始与蒯大富保持距离那样，周泉纓的《必胜》、《炮打》事件让我开始清醒地与沈如槐保持距离。“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已经结盟，为这样一个事件而闹得再次分裂，对414而言没有丝毫的好处，只会让团派看着414的内讧拍手称快。但是政治上的结盟并不表示在所有观点上“三七战团”都要赞同“东方红战团”，在利益上都要服从“东方红战团”。我甚至有一种隐隐的担心，在强大的外部压力和严重的内部分歧下，“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还能不能精诚团结走下去？要是以后414真的成了掌权派，“东方红战团”会不会欺压它的同盟军“三七战团”？会不会把“三七战团”也当做划完几浆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后“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打落在水中”的同路人？对这些，我心中无底，只有担忧。

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我与沈如槐的关系，与“东方红战团”的关系，因这件事而降到了冰点。在我与沈如槐合作的一年时间里，在这件事情上的分歧和矛盾是最严重、最尖锐的。

5、张春桥、毛泽东对《必胜》的态度

张春桥在1967年12月10日说：“我最早读了一下清华《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传单，说414要坐天下，414必胜。他们就是说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文章很隐晦，看了两遍才看懂。”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讲话时说：“清华414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414！414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纓，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毛泽东还说：“周泉纓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414。……你那个414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

那么，《必胜》果然是宣扬了“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了吗？

先再简单回顾一下清华前期文革的实际情况。

蒋南翔并不是被清华师生打倒的，推翻的。如果把抵制工作组错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叫做打天下的话，那么清华的天下是谁打下来的？确实，工作组时期，蒯派受工作组压迫最甚，对工作组的直接反抗也最烈。但是，在1966年的8、9月间，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八八”派在艰苦卓绝中抗击着“清华大学红卫兵”和“八九”派的重压。到9月下旬，以蒯派为核心的“井冈山红卫兵”才竖起大旗，逐步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力军。清华的天下，先不说外力的影响，并不是只靠蒯派一派打下来的，是蒯派和“八八”派共同把清华的天下打下来的。“八八”派和蒯派都是造反派。也就是说，以“八八”为基础的414与以蒯派为基础的团派都是造反派。认为只有团派是打天下的或者只有414是打天下的，都是片面的、不符合清华文革实际的说法。

到12月底“井冈山兵团”成立，标志着清华的造反派打下了清华的江山也坐上了清华的江山。兵团总部委员中，既有蒯派，也有“八八”派。这个时候，确实体现了造反派打下了天下，也坐上了天下。

以后团派与414派的争斗，是造反派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的争斗。团派想一派掌权，不容414染指权力、分享权力。414派不许团派一派掌权，要分享权力，同坐江山。

所以清华的两派争斗，问题实质并不是如张春桥、毛泽东所认为的“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而是同属打江山的团派和414派，以谁为主坐江山的问题。团派要以团派为主，甚至要垄断权力。414要以414为主，至少也得对等。

当然，在414内部，“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的要求也并不完全一致。

我希望414与团派联合起来一起掌权。我能接受以团派为主的联合。

周泉纁在《必胜》中所表达出来的，基本上就是“东方红战团”的愿望。他们认为团派只是完成“划几浆”的“历史任务”后就要“毫不犹豫地他们将他们打落在水中。”“414坐天下”或“以414为主坐江山”，这就是《必胜》的观点。

硬要把“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说成是《必胜》的观点，那是张春桥、毛泽东无理的上纲上线后强加给《必胜》，强加给414的。把这说成是414的观点，更是错上加错的。

张春桥在这里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就算是414坐天下，也仍然是造反派坐天下，并非保守派复辟。张春桥说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他只把团派看成是造反派，414不算造反派。显然，张春桥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说法是歪曲了《必胜》的原意。

毛泽东在张春桥的基础上，又随心所欲地再发挥了一次，把《必胜》的观点归纳成“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这罪名实在有点吓死人！

毛泽东“见微知著”、“洞察秋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段是惯常使用的。彭德怀在他的万言书中，对于大跃进说了句“有失有得”。毛泽东抓住“失”先于“得”大做文章，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吴晗写《海瑞罢官》，本是他为响应毛泽东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精神的号召而写的，吴晗本人还积极紧跟毛泽东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文革前毛泽东点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把这出戏上纲为替彭德怀翻案。这一次对《必胜》，毛泽东故伎重演。他无中生有地把《必胜》的要害说成是“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然后痛批之。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连团派“624战团”批《必胜》那样实事求是。

毛泽东、张春桥为什么要批《必胜》？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414是保守的造反派，他们不喜欢。在7.28召见讲话中，毛泽东总算把他的这层意思扭扭捏捏、曲里拐弯里讲出来了。

6、给《必胜》以正确的历史定位

周泉纁说，《必胜》“就是清华414派的理论纲领”。

这样的说法是极其错误和荒谬的。

414，与当时能在社会中站得住脚的所有红卫兵组织一样，不管是口头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作为理论纲领的。无论现在对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新认识如何，都不能改变当年我

们对此信奉笃行的事实。

《必胜》算什么？它是有一定的理论性。但是它像一个理论纲领吗？它是4 1 4的理论纲领吗？它连正确地总结、归纳四一四思潮都做不到，遑论是4 1 4的理论纲领！要说它是4 1 4的理论纲领，简直是太可笑了！太离奇了！七千人的4 1 4中，有几个人认可周泉纓是4 1 4的理论家了？实在不多！二三十名4 1 4总部委员中，有几个人是把《必胜》作为指导4 1 4的理论纲领的？我看一个都没有（即便是周泉纓本人在当年也不敢如此夸海口）！时至2006年，周泉纓竟敢这样胡说吹牛，全然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拼命往自己的脸上贴金，真让我瞠目结舌！

对于《必胜》，大多数文革的研究者以为这就是4 1 4派的代表作，代表了四一四思潮。

这种认识也是很很不正确的。

思潮，就是思想潮流。四一四思潮，就是4 1 4这一群体大多数人向着某个方向流动的思想潮流。所以，思潮是平民的，不是“精英”的。作为群体里的“精英分子”的思想，有的能够代表群体思潮的，那是主流。有的能够引领群体思潮的，那是潮头。有的是脱离群体思潮的，那是支流。也有的与群体思潮背道而驰的，那是逆流。

《必胜》是这样的一篇作品：它有相当一部分观点是属于四一四思潮范畴的，但它没有完整地、正确地归纳、阐述四一四思潮的基本观点。也就是说，还有许多四一四思潮的基本观点，它没有涉及。它又阐述了不少仅代表别人的观点，其中有很多是错误的，是4 1 4大多数人所反对的；也有一些既前瞻又正确的观点，但并没有被4 1 4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可。所以，把《必胜》阐述的“四一四思潮”等同于4 1 4派的四一四思潮，把《必胜》的观点等同于4 1 4派的观点是错误的。综合而论，《必胜》并不能作为四一四思潮的代表作。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有意贬低《必胜》的历史地位，并不是要有意抹杀《必胜》的历史作用。我只是想恢复《必胜》的历史真实，还原《必胜》的历史真貌。

在此，我郑重地提请国内外的文革研究者注意：如果把《必胜》当作四一四思潮的代表作，那会极大地误解、歪曲了真实的四一四思潮，也就不能全面地准确地揭示和把握清华两派争斗的实质。

因为各种原因，当年4 1 4没有对四一四思潮做过权威的、严格的阐述和界定。在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的时候，沈如槐、陈楚三所写的纪念文章《回忆与思考》，虽然是事后之作，但是，对四一四思潮的归纳、总结、阐述，远比《必胜》要全面、完整、准确得多。如果说《回忆与思考》还有略嫌不足的地方，那就是由“三七战团”首先提出的一些观点在四一四思潮的归纳、总结、阐述中表述得不够充分。例如得到包括“东方红战团”在内为广大4 1 4群众所认可的“新阶段论”、“左派分化论”99等等，显然也应是四一四思潮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必胜》在发表的时候曾引发一场激烈的论战。毛泽东曾对此文发表过评论。因此，《必胜》是一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革文献，值得所有研究文革，特别是研究清华文革的学者专家认真研读。这就是我对《必胜》的历史定位。

第十九节 是是非非周泉纓，毁誉参半理论家

周泉纓是个不断给我们制造惊奇的人。

要是周泉纓炮制了具有轰动效果的《必胜》《炮打》以后，老老实实地躲在某个角落里避风头，很可能风波喧嚣过一段时间后就过去了。毕竟老团一时抓不住他，而被他炮打的陈伯达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说了“不要抓，要教育嘛！”的话语。但是周泉纓张狂的个性和不屈的信念注定了他不会有片刻的安宁。他不听“东方红战团”战友的强力劝止，执意要在校园里亮相、活动。为把炮打陈伯达的材料散发到全国各地以造成更大的影响，他在策划印刷的时候被告发，经谢富治同意，于1967年10月17日夜里由团派“扭送进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审查”。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无动于衷。因为在我心里，我已经不把他当做414战友，而是414的祸害了。既然414自己无法清理门户，现在由团派动手“帮”着清理，我是乐观其成的。

再次看到周泉纓的名字大概是在四人帮倒台以后的1977年吧。有一天，教研组的老师告诉我，说周泉纓来清华贴大字报了。

周泉纓？我听到这个熟悉而又有点陌生的名字，惊诧得长大了嘴，似乎不太相信这个消息。折腾人的文革终于结束了，大家都在揭批四人帮，都在一心一意地工作，他到学校里来贴大字报干吗啊？

下班经过二校门的时候，我专门拐到照澜院，看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周泉纓向来喜欢写长篇文章。大字报有十几张。没一两个人在看。有些路过的，瞄上一眼标题，或者看上几行字，就匆匆离开了。我也没看完。说心里话，我对大字报写些什么内容不感兴趣，所以连题目早已忘记了。我感兴趣的是想看看这究竟是不是周泉纓写的大字报？在他的大字报前是不是人头攒动吸引了众多的眼球？

时过境迁。清华文革前招收的一万多名学生，除了800名低班学生以“新工人”的身份留校当教师以外，全都分配离校了。清华的老师职工大多数是知道周泉纓的。十年前，周泉纓的名字在清华无人不晓。现如今，周泉纓似乎是上一世纪的人物，早就过了气，今非昔比了。我想，要是周泉纓以为他贴出大字报以后还会有像《必胜》、《炮打》时那样的轰动，那肯定要失望的了。

看着几句久违了的语言，我无心再看，就回去了。听说，不久大字报被清洗掉了，不留一丝痕迹。

因为这件事，周泉纓又一次坐了三十个月的牢。

北京市公安局的审查结论是：“周泉纓1977年4月至7月四次来京串联，在清华大学、朝内大街人民出版社对面墙上贴大字报，反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有关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干扰了揭批‘四人帮’运动，在当时拘捕审查是必要的。”

周泉纓来清华贴大字报几个月以后，我听说他又被抓起来了。我心里只是感叹：周泉纓呀周泉纓，你干嘛那么想坐牢的呀？

再以后的几十年，我一直没听到他的音讯。

过了新世纪，有位朋友对我说，他有一本周泉纓的著作，问我想不想看看。

我对周泉纓出书，还是有点好奇的，于是要来看看。

书名叫《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嘿，周泉纓什么时候研究上佛学啦？还是现代佛学？我吃惊不小，静下心来仔细拜读他的大作。

实话实说，我硬着头皮只看了二三十页就看不下去了。我也理解了我的朋友为什么说他也没看完就送给我了。我们都“顿悟”不了他的新“学说”。

再以后，他的有关统一论哲学的多部著作我都没怎么读。偶尔翻翻，感觉现在的周泉纓已经是个不以常人思维的“外星人”。只有那本《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说的是我所熟悉的事情，所以比较仔细地阅读过。

我只能说，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书中的另类观点所击倒。

有朋友给我传来周泉纓在2010年6月6日写给他的校友的一封信。据说此信已经在清华大学校友网上公开发表。我不惜篇幅把其中的一大段摘录如下。周泉纓说：

朗钧说，周泉纓一向被认为是414的灵魂人物，因为他写了《四一四思潮必胜》。但是，很多当年的414人并不承认周泉纓能够代表414，且《四一四思潮必胜》也不能代表四一四思潮。最近当年的一位414核心组成员这样讲：“关于周泉纓，请奉劝外边的人士不要把他看成为414的代表。这不过是他自封的。……他的那些理论，用今天的话来讲，不过是自我炒作，当然还有老蒯谢富治帮他炒，以致炒到最高领导那里去了。文革后他仍在炒，只是已经没了观众。……好多人同我聊起来提到，如果414思潮就是周泉纓观点，他们就要退出。”看来周泉纓当年和现在并不为所有的414人所认可。我认为朗钧这个说法不但符合历史事实，而且非常正确。我说朗钧这个说法不但符合历史事实，是因为我称呼自己的思想是“414思潮”，从来就是为了炒作，而且从来就是为了“炒到最高领导那里去”，这是我文革中使用的一贯的手段，而且今天仍然在更加“肆无忌惮”地使用这种手段，在推销自己的新的更加重大的思想创造。我说朗钧这个说法非常正确，是因为我的“414思潮”至少在当时在414中是少数，而且我的文革思想包括《414思潮必胜》和《炮打陈伯达》都不代表414，包括不代表414的“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正因为如此，我在炮打陈伯达后早已经被开除出414。至于毛泽东主席要称呼我是“414的理论家”，是有他老人家自己的政治目的的，而且我也深信，老人家的治国能力和手段，在《414思潮必胜》发表一年之后，对《414思潮必胜》发表的过程早就了如指掌，因此他老人家不可能不知道《414思潮必胜》不代表414群众的绝大多数。

就上述这段文字，我想说几句话：

1、我不知道朗钧说的那位414核心组成员是谁。414核心组成员不过七八个人。这位核心组成员对周泉纓的评价十分贴切、到位，我完全同意。周泉纓的《必胜》确是仅代表414中极少数成员的观点。

2、周泉纓在这里很勇敢、也很坦率地承认了“我的‘414思潮’至少在当时在414中是少数，而且我的文革思想包括《414思潮必胜》和《炮打陈伯达》都不代表414”。2010年的这个说法更正了他在2006年说过的《必胜》“就是清华414派的理论纲领”的说法。只要他能承认《必胜》不代表414，那我就谢天谢地了。任你周泉纓把《必胜》吹得天花乱坠，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别人信与不信是人家的事情，与我无关，也与414无关。

3、周泉纓说：“我称呼自己的思想是‘414思潮’，从来就是为了炒作，而且从来就是为了炒到‘最高领导那里去’，这是我文革中使用的一贯的手段”。这段话，印证了我当年对周

泉纓的一个判断：周泉纓确实是414中的勇敢分子。

“勇敢分子”这一称谓是我在“四清”的时候才知道，并且真的遇见过的这样的勇敢分子。勇敢分子与积极分子不同的是，勇敢分子在运动早期特别积极，表现特别抢眼，言语行动都相当过火、过头，深入一了解，其言行的背后都有强烈的个人目的。当周泉纓贴出《必胜》，特别是后来贴出《炮打》大字报的时候，我就强烈地感觉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就没考虑过414的安危，没考虑过414的整体利益。他想的只是要让自己的观点和情感痛痛快快地不计后果地发泄出来，以及要让自己与蒯大富、沈如槐齐名的功利心。我与周泉纓的派性都是很强的，但是派性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我既然全身心投身于414，就把414这一团体的派利益看得极重，放在首位。而周泉纓的派性表现在利用414这一平台，顽强地宣扬、炒作他的观点。为了达到炒到最高领导那里去的目的，对自己，他不惜坐牢，对414，任由它分裂、内讧。在周泉纓的心目中，414仅仅是他为了达到自己目的的一个工具。他这样的“派性”极其可怕，也是我难以接受、容忍，甚至是不屑的。

周泉纓以414总部委员的身份，以“四一四思潮必胜”为口号，以414派的影响炒作他只代表几个人不能代表414派的观点，在团派的“帮助”下，一直炒到最高领导那里，让最高领导也相信《必胜》是代表了414派观点的。因此圣口一开，圣喻一下，414派就遭殃。对414来说，周泉纓名副其实是一个祸害，一个罪人。

上述这段议论，当然是派性十足的对往事的议论。不过当年，周泉纓被抓进去以后，大多数老四已经从心里开除了周泉纓的“派籍”，这确是实情。

在414总部里，我与周泉纓的关系最差。在得知毛泽东7.28召见讲话后的那段时间里，我对他简直恨得牙痒痒的。因此，我在本书涉及到的两派头头中，对周泉纓的非议也最多。当然，绝大多数都是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历史老账，并不是我现在的认识。

当毛泽东在召见讲话中说“414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纓”的时候，我这种不在召见现场的人，都能从文字记录的语境中感觉那是毛泽东惯用的嘲讽、揶揄的口吻。毛泽东对414是那样的厌恶，他能对“414的理论家”会有好感吗？但是周泉纓看到以后，竟然把这钦封的“理论家”当真了。他无限感慨地说，“毛主席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发现我的价值的人。”看到这里，我想，同一句话，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感受，竟然如此之大，天壤之别！

“由于毛主席对我的思维能力的器重”，周泉纓走上了一条理论研究的道路。最近十几年，周泉纓专心于理论研究，著作颇丰。先不说他的研究成果究竟如何，他的这种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一生奋斗、锲而不舍的精神，令我由衷的敬佩，也是远非我能所及的。这是我的心里话。

我对周泉纓给自己戴多高的桂冠，不想说三道四。对他自诩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这一研究成果，也没什么兴趣，所以不想妄评这究竟是高深莫测的理论还是虚幻无稽的梦呓。我只希望他不要以为“历史永远只能是任人雕刻的历史”而故意曲解清华文革的历史。至于在他的这一“理论”指导下所得出的有关文革特别是清华文革的一些观点，如“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清华文革是清华百年历史上最荣光的一页”、“能够按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将对立面414派的四五十头面人物打成反革命，能够下令向包围清华文革左派组织的工人群众开枪等等，都说明蒯大富是无愧于自己文革缘分的群众英雄”、“清华武斗中414派死亡的战士永垂不朽”等等，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惊叹，几十年后，周泉纓写作时依旧保持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

他两次坐牢，人生道路坎坷不平，我深表同情。他坐牢那会儿，我是有点幸灾乐祸的。现

在想来，作为公民，他仅仅发表了一点自己的想法，这是他的权利。他是无罪的。我曾经幸灾乐祸，实在是太不厚道了，惭愧得很！

周泉纁的坎坷，不仅在文革中。即使在改革开放年代，厄运还继续纠缠着他。又听说近年来身体也不佳。即便如此，周泉纁仍然付出很多努力与代价，锲而不舍，笔耕不止，常有著作问世。他的这种精神，令我佩服，值得我尊敬！我衷心祝愿他身体健康、多多保重！

最后，我解释一下这个标题。“是是非非周泉纁”，说的是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就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这是事实，不含褒贬。至于“毁誉参半理论家”，也是事实。我这里说的理论家，是不打引号的。因为在派战年代，即使是至高无上的领袖钦定他为“理论家”，我心里根本就没认可。今天，我不赞同他的理论，但我承认他是一个理论家。毕竟，他从事理论工作多年，而且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他已经出版了好几部专著，更发表了难以数计的网文。试问，我同时代的校友中，有谁能出其右乎？作为一个理论家，如果默默无闻，如果没人赞赏或诋毁，那才是可悲的。那些著名的、伟大的、不朽的理论家，即便是马克思，也是毁誉参半的。就我所知，周泉纁在校友这个圈子里，对其顿悟理论持好评的不多，能顿悟的更少。但是在社会上，听说有一大批拥趸。这真是“校内开花校外香”。我祝愿他的顿悟理论能为更多的民众所参透。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 【往事非烟】

不可遗忘的历史——《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序

• 钱理群 •

（出版消息——

《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一书，系北京大学“文革”期间在校、之后作为“末代臭老九”发配社会底层的“老五届”青年学子的自述传，由奚学瑶、张从、孙兰芝主编、北大当年十五个系五十多位校友执笔的文集，近日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或许是矜持，或许是对中国政治的“成熟”，“文革”中老五届一代知识分子，多年来沉潜于社会深层之中，不像“老三届”那样痛快淋漓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是，历史是不会磨灭的，每一代人总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当“老五届”这一代人告老退休之后，他们便纷纷拿起笔来，书写自己告别校园沉入社会后的各种经历，抒发自身的人生感悟，给历史、给子孙们一个交代。北大常为天下先，北大人走出了这一步，不仅仅是代表北大，也是代表着当年被称作“末代臭老九”的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要诉说，他们要呐喊，也告诉后人一个教训：摧残知识分子的“文化大革命”不可再版。这一代人拒绝遗忘，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部臭老九的痛史，便是后人的史鉴。在“文革”红潮涌动的当今，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愿广大读者读之，思之，并广而告之。）

我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60年毕业，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卫生学校任语文教员。这样，我和本书的作者“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据本书的《跋》介绍，老五届包括“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的同学，那么，他（她）们都是我毕业以后入学的，是我的师弟与师妹；他（她）们又在1968或1970年被发配到了基层，其中就有到贵州的，而我已经在那里生活、工作了近十年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似乎又是他（她）们的先行者。

因此，我读这本《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就感到特别亲切，不仅引发了许多记忆，还有更多的感慨与感想。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北大校史：不仅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更注意在北大校史里被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先后对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和1980年北大“校园民主选举运动”作了专门的研究。在研究文革史时，对北大文革前的历史也有所涉及。但直到这次读到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回忆，我才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遗漏：文革后期北大老五届作为“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下放，他们也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且如书中一位作者所说，他们在北大1949年以后的校史里，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的（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就我的研究范围而言，他们上承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不仅文革前期和中期的北大造反运动与“五·一九运动”有着复杂的关系（这还有待于研究），而且当年的北大右派同学早就以“反革命”的罪名发配劳改，现在老五届也以一种“原罪”发配农场和基层改造，尽管彼此处境并不完全相同，某些精神的历程却是相通的。而正是因为有了底层的经验与反思，文革结束后回到北大，才会有1980年校园竞选运动对中国改革问题的大讨论。本书编者说，老五届的“独特行迹，是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卢达甫同学还谈到：“我们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遗忘了老五届大学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这确实是历史研究、文学书写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这是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现在，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回忆当年亲身经历，用“自己描写自己”的方式，开拓了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应该是一个启示与挑战。我写本文，也算是一个回应吧。

所谓“不可遗忘的历史”，在我的理解里，应该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 一，不可遗忘的苦难记忆。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当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一种刻意美化文革历史的倾向，有人就宣称，文革是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最辉煌的一页”，那些苦难都是知识分子虚构与夸大的，即使有苦难，也是推动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有关的知青生活的回忆和文学作品里，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来描述那段历史，过分地强调所谓“青春无悔”。这样的对历史血腥气的着意遮蔽与抹杀，对在“强迫遗忘”的文化、教育环境里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欺骗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今天，当事人的苦难记忆，说出历史真相，是具有“拒绝遗忘，抗拒谎言”的现实意义的。

因此，我读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忆：470名部队官兵、83名大学生，“十八至二十三岁刚踏进社会的稚嫩青年，在狂热高压的政治氛围里，为了政治口号而赴蹈火”，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白嘉芸：《殇痛牛田洋》）；1963年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聂永泰，因为被社会所不容，只能只身到高山雪原进行科学考察并寻求心灵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景仁玲《雪山泪》）；同样是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罚到山西汾西矿务局煤矿当“煤黑子”，而且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视为“从里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心灵折磨比身体伤害更难忍受”（《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这都是不容掩饰的血淋淋的事实。

问题是，这样的从肉体到精神上摧残人的生命，是当时的一个既定方针、政策。老五届毕业前，有过一场关于分配方针的争论。有同学提出“分配应该考虑专业对口”的要求，却被执掌权力的工宣队斥为“修正主义分配路线”，公开批判说：“什么专业对口？就是要枪口对炮口，一切专业只对阶级斗争这个口！”（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那么，什么是当时“阶级斗争这个口”的需要呢？其一，文革初期为了打击官僚体系，放出了青年学生这些‘小鬼’，让他们大闹中华。到了1968年，需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开始让他们回到学校，此即所

谓‘复课闹革命’。无奈‘小鬼’们野性已成，还留在社会继续闹，只得干脆把他们全部赶到农村去，让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农村，再无联合造反的可能。其二这是实现民粹主义理想的需要：不仅将农民、农村理想化，更把知识分子视为打击，甚至消灭的对象，因此，他们不仅号召中学生“上山下乡”，把大学生发配农村、工矿，而且也把教师、老知识分子都打发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全面地、有目的、有组织地改造与消灭知识分子的大战略、大计划。当时，姚文元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便是这个思想路线的典型文本。本书编者把老五届和他们的老师都称为具有“原罪”的“末代臭老九”（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是点出了要害的。他们的意图就是要一举而最后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完全自觉的反知识分子、反知识、反文化的运动。这样，本书的“苦难记忆”，大学生发配到底层，遭遇到从精神到肉体的无情摧残，就绝非偶然，也不是具体执行者的道德、水平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和体制的问题。

这里，我还想就个人的经验，作一个补充。前面说过，我比老五届的同学要早十年到基层接受改造。而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处，不仅在肉体的伤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灵的控制，把专制的逻辑渗透到你的灵魂深处，在“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鲁迅语），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与消灭”，就成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自觉要求。这样的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残酷的。因此，我说过：“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无时无刻咬嚼着我的灵魂”（钱理群：《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

这一切，怎么能够随意、轻率地遗忘！我们年轻时候流行一句话：“忘记，就是背叛”；如果遗忘了这一切，不仅背叛了当年的牺牲者，更背叛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年华。李建宇同学说得好：我们必须追问“谁之罪”，“希望这种噩梦不要重演”（《我的“煤黑子”的生活》）。这就必须从观念到体制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也要反省国民性的弱点，以及我们自己的责任。导致悲剧的观念、制度不变，悲剧就会重演。要知道：当我们遗忘了“狼活活吃掉大学生的时代”，以至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这就意味着那个时代正在回归：今天，各种形态的“狼吃人”的悲剧，难道还少吗？

## 二，不可遗忘的精神坚守。

历史总是两面的：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消灭“臭老九”的险恶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于从来就怀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觉。记得我自己在贵州改造十八年，即使是在大饥荒与文化革命的大混乱的年代，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知识的追求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和信心。我读这本书，最感欣慰，也最为感佩的，也是老五届同学和我一样的坚定信念和坚守。聂永泰同学之所以让我们永远怀念，不仅是因为他那“葬身狼腹”的悲剧凝结着历史的血的教训，更因为他身上那股永远不改、永不放弃的知识分子的“臭气”和“傻气”：“从不关注世俗的人情世故，不关注个人的生存条件”，只是“执着、亡命地不断追求”知识，“除了追求学问，他从不妨碍别人，虽然面对艰苦的环境，仍然毫不消极”，可以说，他是因为这样的坚守，才被狼，也被社会吞噬的。陈焕仁同学说“他的英魂变成了跑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着康定溜溜的城，永远地留在了康藏草原”（《一朵溜溜的云》）；他更永远留在我们每一个北大人的心里。

而且这样的坚守，不是聂永泰一个人，而是老五届一代人。像马云龙同学，一辈子都坚持“脑袋里乱想，嘴上乱说”的北大人的“坏德行”，在文革中因此被关押了六年；改革开放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又因为坚持说真话，而“两次被辞职，一次自动辞职”，始终“不合时宜，不合

领导胃口”，却从不知悔（《票友人生》）。像俞肇智同学，被下放到江西一所县中学，仍不改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脾气，受到学校“土皇帝”的诬陷，就拍案而起：“陈伯达都敢反了，你这个小小的刘某某算何东西！”不料想，从此与刘某和整个地方独立王国结仇，在文革中被批斗许多场不说，文革结束后，他要报考研究生，也遭到百般阻挠。他不屈不挠抗争到底，终于大难不死，逃出虎穴，还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突破重围》）。大多数同学即使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但如奚学瑶同学所说，虽然历经磨难，也没有被社会“完全鞣熟”，依然“保持学生时代的正义感、朝气和锐气”，到了晚年，“无官薄禄”一身轻，“当年豪气换来两袖清风，一丝慰藉”（《旅痕》）。而有些北大“奇人”，更以其多才多艺，不竭的创造力，在晚年习武练舞，演奏琵琶，骑车游遍全国，创造了“辉煌的黄昏”（马以钊：《琵琶弦上说相思》，孔繁钟鑫：《十年磨一剑》，以及曾军、蔡华江的壮举）。记得我们前后几代人，都熟知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关于“如何度过人的一生”的名言；现在，到了走向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我们也做到了“无悔一生”（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

我还想谈谈老五届北大人的这种坚守，在北大校史上的意义。我发现，以往的校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限于北大师生在校期间对北大传统的继承与创造，而较少关注“出校以后”对北大传统的坚守与发展。其中一个具体原因，就是学生毕业以后，就处于分散的个体状态，难以有整体的关注与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就显示出北大老五届的特殊性：他们是北大历史上唯一在离开北大以后，依然保持了某种“群体性”特征的，如前文所引述，本书的编者是将老五届命名为一个“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在“特殊的时代”里，他们遭遇的“群体性磨难”和群体性坚守，就构成了北京大学历史上坚苦卓绝的一页（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在我看来，像聂永泰同学以及其他一些同学的命运与精神，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北大老五届”对北大传统的坚守和发展，是应该进入北大校史的历史叙述的。

### 三、不可遗忘的底层体验。

我在阅读本书时，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李建宇同学回忆说，他被发配为“煤黑子”，尽管是“阎王”（各级领导）和“小鬼”（积极分子）的“肉中刺”，却得到了队里工人的善待，他们“不大关心政治，不具备有文化的人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对伟大领袖没有表现出那么多的热爱，对阶级敌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痛恨”，“他们不会落井下石”，“你干活遇到困难，他们会不声不响地过来帮你；你身处险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抢救你”。正是这些“真诚、善良”的底层民众帮助他们称为的“北京家”度过了人生险境（《我的“煤黑子”生活》）。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遭遇时所发现的：“无论政治的统治力量多么强大，在底层的父老乡亲那里，还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标准，即人们通常所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尽管各级领导都把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普通矿工还是把李建宇这样的大学生，看作是“北京家”，是“落难”而下放到他们这里的，因此也就按照“善待落难人”的民间伦理，用最大的善意对待他。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善待人”的民间伦理，仍在底层社会发挥作用，并神奇地保护了体制的“敌人”，虽然有人执意要消灭的“臭老九”。在这个意义上，底层社会的民间伦理，就构成了“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体制统治的有效性形成无形的破坏和削减”（钱理群：《活下去，还是不活？——我看纪录片“和风鸣”》）。这大概是体制惩罚“末代臭老九”，将他们赶下基层接受“改造”时，所未曾料到的：反而为这批老五届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触与了解底层社会和人民的机会，他们由此而获得的新经验、新体验、新认识，是体制所控制不了的。

奚学瑶、张从同学说得好：“歪打正着的是，我们从堂皇的学术殿堂，沉入艰辛的社会底层，与底层民众零距离接触，知道了他们所爱、所憎、所愿、所求，知道了民间疾苦，与他们交了朋友，从而深层次地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人民大众，变得不那么书生气了”（《韶华如水忆逝年》）。这里谈到的底层经验，对于北大人或许是更为重要的。

卢达甫同学在他的回忆中，提出要“放下这沉重的北大精神包袱”，并进一步提出“还是放弃北大的贵族意识，做一个平民，也许活得更快活更充实更轻松”。（《老五届大学生》）——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北大人及其传统”的问题，引起了我的讨论兴趣。北大人无疑是有精英意识的，前面提到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就是这样的精英意识。在我看来，这样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追求“最高最好最强”的高远目标、理想，开阔的视野，等等，都构成了北大精神传统的重要方面，也是弥足珍贵的。但不可忽视的，是这样的北大精英意识也是自有弱点的，最主要的，就是容易将自我悬空，脱离现实，脱离普通民众，也容易形成“眼高手低”，甚至“志大才疏”的毛病。因此，北大人需要从空中落到地上，用我这些年经常和在校北大学生交谈时的话来说，就是要“认识脚下的土地”，和中国土地上的文化和人民建立起生命的血肉联系。这是北大人在自我成长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功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因此而消弭精英意识，而是要在其中注入对国情、现实的深刻体认，注入底层理解与关怀，也就是将精英意识与平民意识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新的精神境界。文革中将北大老五届学生强制下放，如前文所分析，其目的是在消灭知识分子及其应有的精英意识，是历史的反动；但它却用这样的扭曲的方式，逼迫北大人落到了地上，而且一下子沉入了社会最底层。这就在北大老五届学生的精神上，既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扭曲——这是绝对不能遮蔽、否认的事实；同时也使他们因此获取了新的精神资源——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李檀同学在回首往事时说得很好：“尽管我后来漂洋过海，到美国当上了假洋鬼子，尽管农村那段教书生涯的细节，我已经逐渐淡忘，但是它对我的影响，已经化入了我的血液，进入我的机体，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我的农村教师生涯》），“命运虽然有时残酷，但过去的时光都很美好，人生留给我们许多刻骨的回忆，都是自己的年华，都是财富，都很温馨”。（《我是插队大学生》）——他应该是说出了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共同感受。

这里需要专门说说刚刚离世的刘蓓蓓同学的经验，也算是对她的在天之灵的一个纪念吧。1977年11月，刘蓓蓓还在农村中学教书，看到了《人民文学》上新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从中读出了文学的，也是历史的新时期来临的信息，立即写了评价文章。发表后，一时“洛阳纸贵”，因此有人说她“引领了伤痕文学的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刘蓓蓓是北大老五届的第一个“归来者”。当时就有人猜测她是“通天的高干子弟”，才有如此的胆识。刘蓓蓓在回忆文章里，对此发出了“无限感慨：光通天不立地，对社会弊病和民间疾苦没有切肤之痛，大概也写不出哪怕像我那样一篇没有多少学术性、也就是篇读后感类的小文来！我不过是傻大胆，说出了别人想说但不敢说的话。这‘傻’来自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可能是老北大人的‘通病’”（《离开未名湖的日子》）。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像刘蓓蓓这样的北大老五届，既坚守了北大的传统（“通病”），又有了底层经验和体验，对中国问题有了切肤之痛，就能够做到“通天立地”，这也就标示着北大人的真正成熟。这是此后许多北大老五届同学能够作出特殊的贡献的秘密所在。许多人功成名就以后，一定要回到当年生活的基层寻根（刘庆华：《借得东风好扬帆——记在攀枝花工作过的北大校友》），原因也在于此。

这也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首先，我们需要小心地将这一命题和民粹主义区分开来：这绝不意味着对苦难的美化，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得很清楚：苦难本身就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它是不会自然就成为“精神资源”的。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事实，是许多人都被苦难所压垮，毁了一生：这人为的苦难的罪恶，是永远不能原谅，不容遮蔽的。只有人们走出了苦难，才有可能将其转化为精神资源。所说的“走出”，应该有两个含意。在前文引述的《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的文章里，我曾经提出，首先要正视苦难，正视苦难造成的精神创伤，包括前文说到的，在苦难中的精神自伤，知耻而自悔，这才能走出奴隶状态，获得对历史、社会、他人和自身的清醒。然后，还要超越一己的苦难，进行历史的反思，追问造成苦难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原因，揭示观念的失误，体制的弊端。这样，才能真正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苦难也就转化成了资源。这里，我还

想补充一点，就是要正确对待自己发配期间的底层生活。将其简单的视为不堪回首的过去，逃离了就永不回归，这样的心情和心理，可以而且应该予以理解的同情；但如果因此轻易地将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底层经验全部忘却，把已经建立的和底层的生活与精神联系完全斩断，这就会失去了转化为精神资源的机会，是十分可惜的。我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最感欣慰的，就是在离开贵州以后，几十年来，一直把贵州视为“第二故乡”，与之保持密切联系，从而建立起了“北京大学”与“贵州”两个精神基地，我就可以自由地出入于顶层与基层，中心和边缘，精英和草根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我每次在北京遭遇打击，陷入困境，都到贵州去寻求支持，吸取力量，获得精神庇护：那是我的真正“根”之所在。我也经常把自己的这一人生经验，告诉今天的北大学子和其他学校的大学生，也都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响。在本书里，很多同学都谈到，历经苦难的北大老五届学子，应该把自己的经验教训“留给母校，留给后人，留给历史”。这大概就是我们最后的历史责任吧。这或许也是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2013年4月13日16日

~~~~~

【抗拒遗忘】

韶华如水忆逝年——《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跋

·奚学瑶·张 从·

北大“老五届”（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缘际会，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燕园，汇聚在未名湖畔这一方被人们视为圣洁的水土。我们有幸在如梦似幻的湖光塔影里，经历了高雅严谨的学术熏陶、科学与民主精神传统的洗礼。同学们在生命的春天，青春作伴，相携而行，胸怀大志，刻苦攻读，敞开年轻的歌喉，编织浪漫的理想。“一从大地起风雷”，这一切，都被“文革”彻底改变。北大作为“文革”群众运动的首难地，在一张所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燕园里再也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学生当了“兵”，学者成了“牛鬼蛇神”，两派鏖战，四处风烟，从“大批判”到大武斗，数年之间，仇神骤降，兄弟阋墙，恶之魔影笼罩着这座学术圣殿。纵观中国，以至世界的教育史上，有这样的先例吗？未来的教育界，还能重演这样的魔幻剧吗？！

狡兔死而走狗烹。热潮过后，一度兵戎相见的两大派，终于“大联合”成了“臭老九”。作为原罪者，许多教员被打发到了鄱阳湖里的鲤鱼洲劳动改造，学生被发配到边远、穷困的社会底层，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同学们望断博雅塔，洒泪告别未名湖，告别书生意气与青春憧憬，成了严酷社会现实中的芸芸众生，成了被人冷嘲热讽的没有完成学业的“臭老九”，成了不甘泯于众人而奋发向上、我行我素的另类。从中国最典雅的学府，到了最庸常的社会底层，政治上饱受歧视，专业不对口，生活条件艰苦甚至恶劣，既有极“左”思潮对“臭老九”的政治围困，亦有青春理想与严峻现实的巨大落差，同学们经受着精神与物质双重的心灵煎熬。虽然有极少数不堪忍受折磨而疯癫或自尽，但大多依然秉持着母校赋予的文化自觉与理想坚守，没有沉沦，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坚信严冬过后，中国会有一个美好的春天，“天生我才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本集文章，同学们以自身的经历、不同的人生轨迹，真实而真切地纪录了北大“老五届”学子毕业之后的行迹，个中酸甜苦辣，可谓五味杂陈，处处镌刻着时代的印迹。北大是个大熔炉，她的熏陶洗礼，是我们自觉人生的开始；离开北大，是此种生活的继续，而不是终止。理想愈远大，则与现实的碰撞愈剧烈愈痛苦。北大人多有不趋炎附势的风骨，不同流合污的清高，不随风盲从的独立思考，在各个领域或地区，不仅要站在学术的高地、文化的高地，更要站在

道德的高地。因而，我们的命运，也注定坎坷曲折，与众不同。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这代北大学子可谓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群体性磨难。同学们身处困厄之境，与极左思潮、社会旧习进行了顽强的抗争，有的甚至为之身陷囹圄。即使在这个“读书无用论”猖獗的年代，同学们依然刻苦攻读，对科学与人文知识不离不弃。技术物理系1963级的聂永泰同学，不愿虚度年华，不甘平庸，在工作之余从事科学考察，不幸葬身狼腹……。在苦难之中，大多同学没有颓伤，而是从苦涩中寻求甘甜，于晦暗中盼望光明，在艰困的生活中寻求欢趣，文章中不时流露“臭老九”式的幽默和苦恼人的微笑。歪打正着的是，我们从堂皇的学术殿堂，沉入艰辛的社会底层，与底层民众零距离接触，知道了他们所爱、所憎、所愿、所求，知道了民间疾苦，与他们交了朋友，从而深层次地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人民大众，变得不那么书生气了！北大人不但思想活跃，且多才多艺。北大多“奇人”，“老五届”同样如此。本书收录的北大同学的琵琶情缘、习武练舞、骑车游遍全国等篇章，均体现了北大人卓立特行的精神风貌，北大因此而显其“兼容并包”，显其为“大”。书中有许多章节，描述了同学之间的深情厚谊，在逆境中相濡以沫，互勉互励，让人感动至深。

一朝春雷炸响、拨乱反正，中国大地便万物萌生、气象更新。蛰伏多年的北大“老五届”学子立刻焕发了生机，纷纷突破重围，排除各种藩篱，通过“回炉”、研究生考试、工作调动等多种途径，继续深造，上岗归口，或南来北往，或出国留洋，各自勤勉上进，奋发图强。许多人终于成名成家，声名显赫。他们或为学界泰斗，或为政坛领袖，或发明创造，或著书立说，成就了一流的事业，成为人中龙凤。也有不少人远涉重洋，置身海外，依然心系祖国，为中国现代化而出计献策。北大“老五届”人，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毫无愧色地为中国作出了自身的贡献。

一个大学的教育声誉与教育地位，最终是以校友的素质和成就作为检验标准，以社会对校友们的评价作为衡量的标识。校友是母校的血脉，是母校的根须，未名湖乳汁哺育了我们，我们最终以自己的成绩反哺母校。尽管我们北大“老五届”这一代人，命蹇时乖，但我们大多人都在自己的岗位、自己所处地域，作出了不俗的成绩，我们无愧于母校的培育，我们无愧于“北大人”的称号。我们的独特行迹，是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是北大教育大厦立体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可以对北大的精神文化、教育理念进行更深入的探知。

告别未名湖，屈指算来，已有四十余年。青春不再，韶华如水，我们这一代人，都已进入老境，静夜沉思，让人不免唏嘘感叹！我们这些爷爷、奶奶辈的老人，在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同时，我们也在回顾：我们怀念度过生命春天的母校北大，怀念谆谆教诲的师长，怀念亲如手足的同学，怀念未名湖荡漾的碧波，燕园的红花绿树，以及在其映衬下的激情如火的青春岁月。我们也在思考：何以一夕风雨，北大便成人间地狱，同学老师便成了你争我斗的乌眼鸡？何以这些经过严格考试而精选出来的青年才俊，毕业后飘零四方，成了备受冷落备受欺凌的落汤鸡？这代人可谓在沸水里滚过，在冷水里浸过，在碱水里泡过，从天真、狂热、迷惘而走向理性，走向科学民主、人道人性的康庄大道。这一代青年学子，难道只是北大学子如此？清华、人大、复旦、交大以及其他院校的“末代臭老九”们，不都是大同小异吗？这一代知识分子纷纷的脚步而汇成的历史印迹，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感悟，什么样的教训？西南联大的学子，曾因国难而困厄，而我们这代人的苦难，又源自何处？一个国家，将自己最有理想、最富才华的青年才俊，弃之如敝屣，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这样的方针路线值得我们崇尚缅怀吗？但愿我们的遭遇，不在我们子孙身上重演，不再有牛田洋的惨烈，不再有甘孜雪山的哀伤……愿子孙们读到这本书时，只是当作虚无飘渺、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式的神话！

感谢互联网，它将我们分布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北大“老五届”同窗联系在一起，电邮往来，一起抚今追昔、畅谈时政，品味人生，共享夕照的霞晖。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终将回归自然，隐入历史。当这部书的征集工作行将收官时，不幸传来应征作者中文系196

2 级同学刘蓓蓓病逝的噩噩。当年高考作文为北京考生之冠的才女，悄然消隐在苍茫的夜色之中。一叶落而知秋肃，深秋已然来临，冬日随后将至，一代风流，终将被风吹雨打去。雁过留声，人过留迹，这部集子，也算是我们北大“老五届”学子留给母校，留给后人，留给历史的一份纪念品吧！

2 0 1 1 年春天起始，我们通过互联网，开展了《告别未名湖》书稿的征集活动，得到了许多北大“老五届”同学的热情响应。同学们惠赐七十多篇来稿，编委会从中选取了 6 1 篇集结付梓。在征集与编辑过程中，编委会在北大和北戴河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开展此项活动的有关事宜，认真地审阅了稿件。征文活动也为校友们搭建了一个友谊的平台，不少海内外同学借此取得联系，互通音问。当年“老五届”的授课教员，后来的北大校长陈佳洱老师，一直惦念着遭逢特殊命运的北大“老五届”学生，十分认真地为此书题写了书名，使我们感到分外亲近。我们也感谢北大校友会常务副主任郝斌老师、著名学者钱理群老师出席了编委的北大座谈会，并给我们以具体指导。钱老师还在繁忙之中，为我们文集撰写序言，我们甚感荣幸。我们也感谢前北大物理学院党委书记郭建栋同学、北大“老五届”校友陶令煌同学给予的具体帮助，感谢北大杭州校友会、广州校友会、天津校友会、河北校友会的热情鼓励与支持。

此书的编辑，大体上以作者毕业去向的初始地区或主要工作地域为经，以入学先后为纬。作者来自北大当年 1 8 个系中的 1 5 个，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当然，也由于信息所限，许多同学未能知晓并参与此项活动，难免有遗珠之憾。我们的编辑工作，囿于水平，料有错讹，不当处，还望读者直言相告。倘有机会再版，当予补正。

2 0 1 3 年 6 月改定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 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 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 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 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 cnd. org/
